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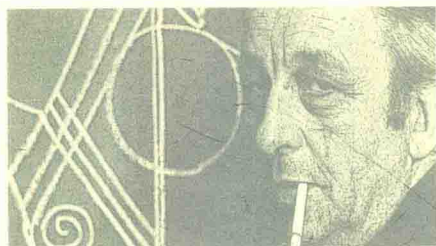
Montesquieu

La politique et l'histoire

Louis Althusser



精神译丛·徐晔陈越主编
阿尔都塞著作集·陈越编



[法] 路易·阿尔都塞 著 霍炬 陈越 译

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

西北大学出版社

Montesquieu

La politique et l'histoire

Louis Althusser

精神译丛·徐晖·陈越主编
阿尔都塞著作集·陈越编

[法] 路易·阿尔都塞 著 霍炬 陈越 译

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



西北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陕版出图字 25-2012-2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 / (法) 路易·阿尔都塞著;
霍炬,陈越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 5
(精神译丛/徐晔,陈越主编)
ISBN 978-7-5604-4520-5

I. ①孟… II. ①法… ②霍… ③陈… III. ①孟德斯
鸠(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1689—
1775)—思想评论 IV. ①B565.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69569 号

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

[法]路易·阿尔都塞 著
霍炬 陈越 译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259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7.25

字 数:150 千

版 次:2020 年 5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4520-5

定 价:5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 029-88302966 予以调换。



Rethinking
Reconstructing
Reproducing

*

“精神译丛”
在汉语的国土
展望世界
致力于
当代精神生活的
反思、重建与再生产

*

本书翻译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项目号: 08BZW006) 支持。



路易·阿尔都塞

纪念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诞辰一百周年

1918—2018

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序

艾蒂安·巴利巴尔

为这套大规模的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作序,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从1960年到1965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跟随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学习,后来又成为他的合作者(尤其是《阅读〈资本论〉》的合作者,这部集体著作来源于1964—1965年他指导下的研讨班)^①。这份荣幸来自这套中文版著作集的负责人,尤其是吴志峰(吴子枫)先生的一再友好要求。后者去年受邀作为访问学者到尤里姆街的高师专事阿尔都塞研究,并特地去查阅了存于“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IMEC)的阿尔都塞资料。他在巴黎找到我,和我进行了几次非常有趣的交谈。我要感谢他们的这份信任,并向他们表达我的友情。当然,我也要向这里出版的这些著作的未来读者表达我的友情。由于这些著作来自遥

^①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罗歇·埃斯塔布莱(Roger Establet)、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阅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 1965),修订新版,法国大学出版社(PUF),“战车丛书”(Quadrige),1996年。

远的大陆，长期以来在传播方面存在着种种困难；由于这个大陆与中国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现代历史（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共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由于这些著作可以追溯到一个属于“历史的”过去时代（只有对其中一些老人不能这么说），也就是说一个被遗忘的时代——所以对中国读者来说，要重新把握他们将要读到的这些文本的意图和言外之意，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我相信编者的介绍和注解会大大降低这项任务的难度。就我而言，我在这里只想对阿尔都塞这个人以及他的著作进行一个总体的、介绍性的评述，然后我要阐述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阿尔都塞著作的中文译本尤其显得有意义，甚至尤其重要。

路易·阿尔都塞是欧洲 20 世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在若干年间曾引起世界性的轰动，然后才进入相对被遗忘的状态。然而，这种状态现在似乎正在让位于一种新的兴趣，部分原因在于，这位哲学家大量的未刊稿在身后出版，非常明显地改变并扩展了我们对他的思想的认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相对于阿尔都塞去世之时（恰逢“冷战”结束），世界形势又发生了新变化，他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他所提出来的一些概念，现在似乎又再次有助于我们对当前的时代进行反思，哪怕那些问题或概念已经具有了与先前不一样的意义（这也是必然的）。

阿尔都塞 1918 年出生于阿尔及尔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确切地说，不能算是一个“侨民”家庭，而是一个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公务员和雇员家庭），既受到非常古典的学校教育，又受到非常严格的宗教教育。他似乎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有神秘主义倾向，政治上也偏于保守。1939 年，阿

尔都塞通过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是法国培养科学、人文学科教师和研究者的主要机构,招收学生的数量非常有限)的入学考试,就在他准备学习哲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了。他的生活因此被整个打乱。他被动员入伍,其后与成千上万溃败的法国士兵一起,被德军俘虏。他被送到一个战俘营(stalag),在那里待了五年。尽管如此,由于他(作为战俘营护士)的关押条件相对来说好一些,所以可以读书、劳动,并建立大量社会联系,其中就包括与一些共产主义青年战士之间的联系。获得自由后,他恢复了在高师的学习,并很快就通过了教师学衔考试(学习结束时的会考),然后他自己又被任命为准备参加教师学衔考试的学生的辅导教师。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自己职业生涯结束,并且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指导了几代法国哲学家,其中有一些后来很出名,比如福柯、德里达、塞尔、布尔迪厄、巴迪乌、布弗雷斯、朗西埃等。有很短一段时期,阿尔都塞继续留在一些天主教战斗团体里(但这是一些左翼倾向的团体,特别是那些依靠“工人教士”经验、很快就被天主教会谴责并驱逐的团体)^①,为它们写了

① 这是一个叫“教会青年”(Jeunesse de l'Eglise)的团体,组织者是蒙蒂克拉尔神父(Père Maurice Montuclard O. P.)和他的女伴玛丽·奥贝坦(Marie Aubertin)。蒂埃里·科克(Thierry Keck)的著作《教会青年(1936—1955):法国进步主义危机的根源》(*Jeunesse de l'Eglise 1936—1955. Aux sources de la crise progressiste en France*) [艾蒂安·富尤(Etienne Fouilloux)作序, Karthala 出版社, 2004年]为青年阿尔都塞在“教会青年”团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他在团体中与其他成员结下的长久友谊提供了大量细节。关于前者,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 Boutang)在他的传记中也已指出(指布唐的《阿尔都塞传》——译注)。

一些短文章。1948年，阿尔都塞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当时法共的领导人是莫里斯·多列士。法共在德占时期的抵抗运动中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并依靠苏联（苏联先是在1943年通过第三国际，而后又通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掌控着法共的政策和领导人）的威望，在当时成为法国最有力量的政党，与戴高乐主义势均力敌。当时，尽管党在雅尔塔协定的框架下实际上放弃了夺取政权的努力，但革命的希望依然很大。在这同一时期，阿尔都塞认识了埃莱娜·里特曼-勒戈蒂安，后者成了他的伴侣，再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埃莱娜比阿尔都塞大将近十岁^①，战前就已经是法共党员了，此时还是一个地下党抵抗组织的成员。但在事情并非总是能得到澄清的情况下，她被指控有“托派倾向”，并被开除出党。她对阿尔都塞政治观念的形成，尤其是在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表述方面，影响很大。

冷战期间，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即使没有成为镇压的对象，至少也是怀疑的对象，同时他们本身也因知识上的极端宗派主义态度而变得孤立（这种知识上的宗派主义态度的基础，是日丹诺夫1947年宣布的“两种科学”的哲学教条——这种教条还扩展到了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这期间阿尔都塞主要只是一些教育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论点；他还就历史哲学中一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进行了一次讨论。所

^① 埃莱娜（1910—1980）比阿尔都塞（1918—1990）实际大八岁。——译注

以他当时与“战斗的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距离^①。在教授古典哲学之外,他的个人工作主要涉及政治哲学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主义者,以及帕斯卡尔和斯宾诺莎,后两位作为古典时期“反人道主义”的反命题形象,自始至终都是阿尔都塞获得灵感的源泉。在接下来研究“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观念”^②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中,阿尔都塞同样在继续深化他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著作”的认识,尤其是那些当时才刚出版的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的政治观念在当时与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路线是一致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危机(如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殖民地发生战争(包括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共对起义持有限的支持态度)的时刻^③。

接下来的时期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特性。随着1956年苏共二

① 青年阿尔都塞在一篇文章的题铭中以颇具斯大林主义特点的口吻引用了日丹诺夫的话(阿尔都塞引用的话是“黑格尔的问题早已经解决了”。——译注)。这篇《回到黑格尔:大学修正主义的最后废话》(*Le retour à Hegel. Dernier mot du révisionisme universitaire*)是为了反对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而写的,后者不久就成为他在高师的朋友和合作者,并经常以自己黑格尔的阐释反对科耶夫(Kojève)的阐释。这篇文章1950年发表在《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上,后收入《哲学与政治文集》(*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第一卷,Stock/IMEC,1994年,第243-260页。

② 1947年10月,阿尔都塞在巴什拉的指导下完成高等教育文凭论文《论G. W. F. 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Du contenu dans la pensée de G. W. F. Hegel*)。正文中提到的标题与这里的实际标题不同。——译注

③ 从这种观点看,他在1978年的未刊稿《局限中的马克思》(«Marx dans ses limites»)中对戴高乐主义的分析非常具有启发性。参见《哲学与政治文集》,第一卷,前引,第428页及以下。

十大对“斯大林罪行”的披露，以及随后 1961 年二十二大“去斯大林化”运动的掀起，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铁幕”内外）都进入了一个混乱期，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但马克思的思想却正在获得巨大声誉，尤其是在那些青年大学生当中——他们受到反帝国主义战争榜样（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和古巴革命成功的激发，从而感受到专制社会结构的危机正在加剧。让-保罗·萨特，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在他 1960 年的《辩证理性批判》中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地平线”^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问题，无论是对于共产党组织和它的许多战士来说，还是对于大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以及人文科学方面的专家、艺术家和作家来说，都成了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阿尔都塞的几次干预——关系到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和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难题的阐释——产生了预料不到的反响，先是在法国，后来又波及国外。1965 年出版《保卫马克思》（由写于 1960 年至 1965 年的文章汇编而成）和《阅读〈资本论〉》（和他的学生艾蒂安·巴利巴尔、罗歇·埃斯塔布莱、皮埃尔·马舍雷和雅克·朗西埃等合著）之后，阿尔都塞成了著名哲学家，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在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圈子内，还是在那个圈子外，都引发了大量争论和论战。他

^① “因此，它[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环境还没有被超越。[……]但是，只要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技术进步还未把人从匮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命题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不可超越的证明。”参见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60), Gallimard 出版社, 1985 年, 第 36、39 页；也参见《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28、32 页。译文有修改。——译注

似乎成了他自己后来所说的“人道主义论争”(它搅动了整个法国哲学界)的主角之一。阿尔都塞所捍卫的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相对立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显然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不仅从哲学的层面,而且还从政治的层面,否定了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倾向。他抨击经济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因为在他眼里,这种结合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但有些人却以此为名,预言两种社会体系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会“合流”。不过,他是通过一些与(列宁去世后)被斯大林理论化并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被官方化了的“辩证唯物主义”毫不相关的理论工具,以一种哲学观的名义来进行抨击的。阿尔都塞提出的哲学观,不顾一些文本上的明显事实,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当中的黑格尔遗产,转而依靠斯宾诺莎的理智主义和唯物主义。在阿尔都塞的哲学观看来,斯宾诺莎是意识形态理论的真正奠基人,因为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构成个人主体性的社会想象结构——这是一种马克思预示了但同时“错失了”的理论。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的哲学观非常强有力地促进了斯宾诺莎研究和斯宾诺莎主义影响的“复兴”——他的这整个时期都打下了这种影响的印记。阿尔都塞的哲学观还同时从卡瓦耶斯(1903—1944)、巴什拉(1884—1962)和康吉莱姆(1904—1995)的“历史的认识论”中借来一种观念,认为“常识”和“科学认识”之间存在着一种非连续性(或“断裂”),所以可以将知识的辩证法思考为一种没有合目的性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概念的要素展开,也并不是服从于意识的优先地位。而在笛卡尔、康德和现象学对真理的理论阐述中,意识的标准是占统治地位的。最后,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的思想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之间寻求一种“联盟”。弗洛伊德作为

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当时仍然被官方马克思主义忽视甚至拒斥,但另一方面,他的这个地位却被拉康(1901—1981)所复兴。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这里的关键是既要指出意识形态与无意识之间的相互构成关系,又要建构一种关于时间性和因果性因而也是关于实践的新观念。

由于所有这些创新,阿尔都塞的哲学话语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圈子,更确切地说,他将这些争论变成了另一个更普遍的哲学事业的一个方面,那个哲学事业不久就被称为**结构主义**(尽管这个词的含义并不明确)。因此,阿尔都塞成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遇点,得到了双方的滋养。在他的学生看来,他为两者的“融合”带来了希望。像所有结构主义者一样,他发展了一套关于**主体**的理论,这个主体实际上不是认识和意志的理想的“起源”^①,而是诸多社会实践的、各种制度的、语言的和各种想象形态的“后果”,是一种“结构的行动”^②。与其他结构主义者不同,他试图定

① “起源”原文为“origine”,同时也有“起点”的意思。值得指出的是,阿尔都塞一贯反对“起源论”,在他看来,唯物主义哲学家(比如伊壁鸠鲁)“不谈论世界的起源(origine)这个无意义的问题,而是谈论世界的开始(commencement)”。参见《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Initia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s*),法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6页。——译注

② “结构的行动”(action de la structure)这个词是由阿尔都塞和拉康共同的门徒伊夫·迪鲁(Yves Duroux)、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让-克洛德·米尔内(Jean-Claude Milner)所组成的那个团体发明的。参见再版的《分析手册》(*Cahiers pour l'Analyse*) (这是高等师范学校认识论小组的刊物),金斯顿大学(Université de Kingston)主持编印,第9卷(文章只署了J.-A. 米勒的名字)(<http://cahiers.kingston.ac.uk/pdf/cpa9.6.miller.pdf>)。

义的结构概念不是(像在数学、语言学甚至人类学中那样)以识别形式的**不变式**为基础,而是以**多重社会关系**的“被过度决定的”结合(其具体形象在每种**历史形势**中都会有所改变)为基础。他希望这样能够让结构的**概念**不但服务于对社会**再生产**现象的分析,而且首先服务于对**革命阶段**现象的分析(在他看来,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革命的典范)。这样一来,历史就可以被同时思考为(没有主体的)过程和(没有合目的性的)事件。

我一直认为,这种哲学的建构,或更确切地说,由这种哲学建构所确立起来的研究计划,构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它的全部可能性还没有被穷尽。它身后还留下了好些未完成的难题性,比如对理论和艺术作品进行“**症状阅读**”的难题性(它肯定影响了德里达的“解构”),还有“有差别的历史时间性”的难题性(时常接近于被阿尔都塞完全忽视了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这两种难题性都包含在《阅读〈资本论〉》阿尔都塞所写的那部分当中。但在接下来的时期,从1968年五月事件之前开始(虽然阿尔都塞没有参与其中,但这个事件给他带来了创伤性的后果),阿尔都塞对自己的哲学进行了根本的改写。他进入了一个**自我批评**期,然后在新的基础上**重构**了自己的思想,但那些基础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他没有忘记斯宾诺莎,但通过放弃结构主义和“认识论断裂”,他力图为哲学,并由此为历史理论,赋予一种直接得多的政治性。由于法共官方发言人和他自己的一些(成为在五月运动之后建立起来的“**毛主义**”组织生力军的)青年学生同时指责他低估了阶级斗争以及哲学中的阶级立场的重要性,阿尔都塞开始重新估价这种重要性,虽然是根据他自己的方式。这里不能忘记的是,这种尝试是在一种特别的语境中展开的,这个语境就

是，在欧洲，发生了重要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同时在“左派”即极端革命派倾向与改良主义倾向之间产生了分裂，改良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结果是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而后者在改变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博弈方面最终失败，随后被新自由主义浪潮所淹没。当时阿尔都塞似乎通过一种他力图为自己的思想所发明的新配置，撤退到一些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难题上去了（但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们却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尽管在这个诊断底下，还需要作更细致的辨别）。然而，他的有些难题还是获得了广泛的共鸣，这一点我们在今天可以更清楚地感觉到。尤其是他关于“意识形态唤问^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成的理论就是这样——它是 1971 年从当时一份还

① “唤问”原文为“interpellation”，其动词形式为“interpeller”，它的含义有：1.（为询问而）招呼，呼喊；2.（议员向政府）质询，质问；3. [法]督促（当事人回答问题或履行某一行为）；4.（警察）呼喊，追问、质问，检查某人的身份；5. 强使正视，迫使承认；6. 呼唤（命运），造访。詹姆逊把它解释为“社会秩序把我们当作个人来对我们说话并且可以称呼我们名字的方式”，国内最早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译本译为“询唤”，系捏合“询问”和“召唤”的生造词，语感牵强，故不取。我们最初使用了“传唤”的译法（参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似更通顺；但由于“传唤”在法语中另有专词，与此不同，且“传唤”在汉语中专指“司法机关通知诉讼当事人于指定的时间、地点到案所采取的一种措施”，用法过于狭窄，也不理想。考虑到这个词既是一个带有法律意味的用语，同时又用在并非严格司法的场合，我们把它改译“唤问”，取其“唤来问讯”之意（清·黄六鸿《福惠全书·编审·立局·亲审》有“如审某里某甲，本甲户长，先投户单，逐户唤问”一说）。有的地方也译为“呼唤”。——译注